

# 祖乙生父考

[台湾]江达智

(成功大学 历史学系, 台南 70101)

**摘要:**自甲骨文发现后,学者根据甲骨文的内容,修正了商王祖乙之生父为仲丁。该文从商王朝的继统制度、宗法制度,并且辅以殷都屡迁的原因等三方面,认为祖乙之生父应仍以《史记·殷本纪》所载之河甲为是。

**关键词:**祖乙; 继统制度; 宗法制度; 迁都

**中图分类号:**K11 **文献标识码:**A

**文章编号:**1673-2219(2009)03-0001-06

## 一 前言

《史记·殷本纪》载:“帝河亶甲崩,子帝祖乙立。”其中将河亶甲列为祖乙之父。然自甲骨文发现以来,学者对此世系有所修正。例如王国维在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》一文中即云:

惟据《殷本纪》则祖乙乃河甲子,而非中丁子。今此片中有仲丁而无河甲,则祖乙自当为中丁子,《史记》盖误也。<sup>[1]</sup>

祖乙之父,究竟是《史记·殷本纪》所说的河亶甲?还是如甲骨文研究者所言的仲丁?

## 二 商王朝的继统制度

王国维在《殷周制度论》中,认为商王朝的继统制度是“弟及为主,子继为辅”,其云:

商之继统法以弟及为主,而以子继辅之,无弟然后传子。自成汤至于帝辛三十帝中,以弟继兄者凡十四帝;以子继父者,亦非兄之子,而多为弟之子。惟沃甲崩,祖辛之子祖丁立;祖丁崩,沃甲之子南庚立;南庚崩,祖丁之子阳甲立。此三事,独与商人继统法不合。此盖《史记·殷本纪》所谓中丁以后九世之乱,其间当有争立之事而不可考矣。<sup>[2]</sup>

此后,许多学者著文,或补充或修正王氏之观点。综合言之,对于商王朝的继统制度,至少有着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:

①兄终弟及、以子继父相互并用,并无主辅之分。<sup>[3]</sup>

②子继为常,而弟及为变。<sup>[4]</sup>

③幼子继承制。<sup>[5]</sup>

④嫡长子继承制。<sup>[6]</sup>

⑤立壮。<sup>[7]</sup>

这些众说纷纭的观点中,那一种才较符合商王朝的继统制度?

根据甲骨文研究修正的商王朝世系表来看,商王朝自成汤(太乙)建立以后的王位继统制度确实包含着父死子继、兄终弟及两种方式交相运用。陈梦家根据商王世系表中同辈兄弟及位者,其数不超过四人,但卜辞中同一辈兄弟往往不止四人(如祖甲世除祖己、祖庚外,尚有兄壬、兄癸均未及王位)的现象,认为:

由此可见商代传统法并没有一种固定的传弟传子法,凡弟或子之所以及王位必另有其法规,可惜我们无法推知。<sup>[8]</sup>

但是,从卜辞中对先公先王的祭祀中,我们可以看出商人有重直系而轻旁系的情形,而且自上甲以下,自有一直系系统。每一代不管兄弟几人为王,都有一人被确定为直系的特点,恰好说明了商王朝的继统制度,在精神上仍是以父死子继为主的。<sup>[9]</sup>

在父死子继的精神之下,可能是因为先王逝世时,合法的继承人或许年龄太小,或在其它体心方面不够条件,于是才有以弟继兄之情况发生,以救父死子继之穷。<sup>[10]</sup>然而,因为自有其继统法规存在,兄弟相及到某一程度,便需还位于合法的继承人。商王朝的继统制度,就在这种情形下,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便交互运用着。

然而,从世系表中仍可归纳出商王朝的继统规则,即如郑慧生所言:

自汤至于祖甲,是商代的早、中期。是时传位制度,用兄终弟及,无弟而后传子。早期自汤至于南庚,弟死后传兄之子;中期自阳甲至于祖甲,弟死后传弟之子。晚期祖甲之后,商之传位制度,完全由父死子继代替了兄终弟及。<sup>[11]</sup>

收稿日期:2008-02-20

作者简介:江达智,男,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,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,专长:先秦史、中国古代生命礼俗。

由此可见，在兄终弟及制配合下的商王朝继统制度，其合法的继承人，早期是长兄之子，中期以后改为弟之子。

何以会有如此地转变？王国维之观点可为参考：

夫舍弟而传子者，所以息争也。兄弟之亲本不如父子，而兄之尊又不如父，故兄弟间常不免有争位之事。特如传弟既尽之后，则嗣立者当为兄之子欤？弟之子欤？以理论言之，自当立兄之子；以事实言之，则所立者往往为弟之子。此商人所以有中丁以后九世之乱，而周人传子之制正为救此弊而设也。<sup>[12]</sup>

商王朝的继统制度，其合法继承人原是长兄之子。但在配合着兄弟相及制之时，弟王之子由于其父为王之便，其所拥有的权力，往往超过合法的继承人。因此，王位在做世代交替时，发生王位争夺的机率极大，此即为王氏文中“商人所以有中丁以后九世之乱”产生的根本原因。

关于“中丁以后九世之乱”的内容，司马迁在《史记·殷本纪》有着以下的记载：

自中丁以来，废适而更立诸弟子，弟子或争相代立，比九世乱，于是诸侯莫朝。

其中文字虽然简短，但配合着前述商王朝继统制度的规则，仍可分析出个中实情。仲丁之父太戊，在卜辞世系中为小甲之弟、雍己之兄，论资格仲丁绝无继位之可能。然而，或许由于太戊在位时间太久<sup>[13]</sup>，仲丁累积了日后夺位的实力；即使太戊如《史记·殷本纪》所载，为小甲、雍己之弟，在商王朝早期合法继承人为长兄之子的规则下，仲丁亦无资格为王。可见仲丁之立，是由篡夺而来。

自仲丁首开篡夺之例后，直到盘庚以前，历经外壬、河亶甲、祖乙、祖辛、沃甲、祖丁、南庚、阳甲，在此九位商王在位期间，夺位之事屡见不鲜。例如，沃甲之后，王位回传给其兄祖辛之子祖丁，然而祖丁之后，却由沃甲之子南庚即位；南庚之后，又由祖丁之子阳甲继位。南庚为祖丁之堂兄弟，原无成为商王之资格，其即位亦应是篡夺而来。其后，阳甲之继立，极有可能是从其堂叔（或伯）父南庚的手中，把原本就是其应得的王位抢夺回来而已。

至于商王祖乙之立，是否也与夺位有关？若其父为仲丁，则其即位之资格自无疑义。然而，若是祖乙之父为《史记·殷本纪》所言的河亶甲，则在商王朝早期长兄之子为合法继承人的规则下，祖乙之立当然亦是破坏原有继统制度，经由篡夺而来的（祖乙世的合法继承人应为仲丁之子，而非河亶甲之子祖乙）。<sup>[14]</sup>

由于仲丁至阳甲九世，商王朝的继统制度屡遭破坏，因此才有日后将合法继承人由长兄之子改为弟之子的变革，甚至于祖甲以后，更直接采以父子相继的方式，以达到“息争”目的。

因此，从上述商王朝的继统制度，以及仲丁以来因继统制度遭破坏而产生的“九世乱”来看，商王祖乙之生父确实有可能为河亶甲，而非仲丁。

### 三 商王朝的宗法制度

王国维认为商王朝没有传子之制，因此也就没有嫡庶之制；没有嫡庶之制，则亦无宗法制度。其云：

由嫡庶之制而宗法与服术二者生焉。商人无嫡庶之制，故不能有宗法。藉曰有之，不过合一族之人奉其族之贵且贤者而宗之。其所宗之人，固非一定不可易，如周之大宗、小宗也。<sup>[15]</sup>

宗法是家族的组织法，对王室而言，它是王位继承制的法则。<sup>[16]</sup>由前述商王朝之继统制度，已知商代王位的继承自有其一套法则存在；此外，商王朝祖甲以下的最后几代，已完全是父子相继。而且从《吕氏春秋·当务篇》之记载：

纣之同母三人，其长子曰微子启，其次曰中衍，其次曰受德。受德，乃纣也，甚少矣。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中衍也，尚为妾。已而为妻，而生纣。纣之父、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，大史据法而争之曰：“有妻之子，而不可置妾之子！”纣故为后。<sup>[17]</sup>

商王朝至迟在晚期已有立嫡制度。因此王氏对于商王朝无宗法制度的论点，后人亦多予以修正与补充。胡厚宣即指出：

或谓“殷代无宗法”，此不确之论也。夫宗法之含义有三：一曰父系；二曰族外婚；三曰传长子。此在殷代，似皆不成问题。<sup>[18]</sup>

目前学界对于商王朝已有宗法制度，多持肯定的看法。

商王朝之宗法制度可用以论证商王祖乙生父者，则要属其中有关直系（大宗）与旁系（小宗）的问题。

商王对其先公先王的祭祀颇为重视，从卜辞中对先公先王祭祀的卜问中，可以发现有着直系（大宗）与旁系（小宗）的分别；而且，在甲骨卜辞内，凡一世之内有兄弟数人及位者，只能有一人为直系，而其所以成为直系者，必须具备下列三项条件，否则即为旁系：

- ①有子继为王者；
- ②其配偶享有周祭之资格者；
- ③在选祭卜辞中，与其它一世一王的先祖同受祭祀者。<sup>[19]</sup>

学者根据卜辞的记载，列出自上甲以下的直系（大宗）系统，即上甲—报乙—报丙—报丁—示壬—示癸—太乙—太甲—太庚—太戊—仲丁—祖乙—祖辛—祖丁—小乙—武丁—祖甲—康丁—武乙—文武丁—帝乙—帝辛。

从这一直系（大宗）系统来看，祖乙接于仲丁之后，则仲丁为祖乙的生父似无疑问。这也是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将祖乙列为仲丁之子，而不从《史记·殷本纪》之记载最有力的证据。然而，在某些卜辞中，非前述直系（大宗）系统的商王，亦有被列为直系的情形。其中，沃甲（羌甲）最具有代表性。例如：

王固曰：（不吉）。南庚巷，祖丁

(𠩺)，大示祖乙、祖辛、羌甲𠩺。(《丙》三九五)

己丑卜，大贞：于五示告(缺)丁，祖乙，祖丁，羌甲，祖辛。(《粹》二五〇)

许进雄据此即认为：

羌甲于第一期、第二期都有与祖辛同被认为是大宗的例子。……我们可以第二期祖庚时，羌甲是被认为大宗之一的，则羌甲之能为大宗，当然是因为有子南庚即位之故了。<sup>[20]</sup>

由此可见，商王朝的这种直系(大宗)、旁系(小宗)的制度，最初并非如此严格规定一世只能有一位直系大宗的，只要有子即位，就被视为直系。

相较于沃甲，河亶甲(戈甲)在甲骨卜辞中，亦似乎同样有被视为直系(大宗)的情形。例如：

乙未酒 品：上甲十，报乙三，报丙三，报丁三，示壬三，示癸三，大乙十，大丁十，大甲十，大庚七，小甲三，(缺)三，祖乙(缺)。(《甲骨文合集》32384)

严一萍补其缺文后，此卜骨完整之卜辞如下：

乙未酒 品：上甲十，报乙三，报丙三，报丁三，示壬三，示癸三，大乙十，大丁十，大甲十，大庚七，小甲三，(大戊十，中丁十，戈甲)三，祖乙(十，羌甲三)。<sup>[21]</sup>

此一选祭卜辞被归为第四期，其对直系(大宗)之规定，似亦无第五期来得严格。其中，除小甲、戈甲、羌甲外，其余均为直系诸王。羌甲(沃甲)因有子南庚即位，故在某些时期的卜辞中，亦将其列为直系已如前述。至于小甲与戈甲(河亶甲)，其地位和直系诸王等同的原因究竟为何？

前述商王朝继统制度时，在早期传兄之子的原则下，若无仲丁的破坏继统制度，小甲之子当为合法之继承人，则小甲当然也就跻身于直系诸王之列。小甲在此卜辞中之所以被视为直系，或许与此补偿作用有关。至于河亶甲，他没有小甲的情形，则其亦被视为直系，是否也与沃甲一样是因为有子即位所致呢？果真如此，则河亶甲极有可能如《史记·殷本纪》所载，确实为祖乙之生父。

或许有人会质疑，若祖乙为河亶甲之子，而非仲丁之子，则仲丁即无具备被列为直系诸王的资格。我们认为仲丁之所以被列为直系(大宗)，可能与其首先破坏商王朝的王位继统制度，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。因为，若无仲丁的夺位，则仲丁以下的诸王，在原有继统制度规定下，均无资格即位为商王。我们可以说，仲丁是其后诸王的源头。因此，仲丁在此情形下被列为直系，是有可能的。

但是，到了帝乙、帝辛时期，商王朝各种制度规定趋于严格之际，在一世只有一王为直系的规定下，小甲、沃甲均被视为旁系。而仲丁、河亶甲这一辈中，也只能有一王为直系的情形下，在权衡二人的重要性后，只有舍有子(祖乙)即位为王，原本就应是直系的河亶甲，而取仲丁

了。然而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才会使得日后研究甲骨文的学者，会将祖乙列为仲丁之子，而不赞同《史记·殷本纪》之记载。

#### 四 殷都屡迁的原因

商王朝在建立王朝前后，曾有多次的迁都。东汉张衡在《西京赋》中即云：

殷人屡迁，前八后五，居相圯耿，不常厥土。

其中所谓的“前八”，是指成汤灭夏以前，殷人曾有过八次的迁移，此即《史记·殷本纪》中所称的“自契至汤八迁”；而所谓的“后五”，系指商王朝自成汤至盘庚之前所做的五次迁都行动，《尚书·盘庚》“先王有服，恪谨天命，兹犹不常宁；不常厥邑，于今五邦”，即记载此事。

殷人建立王朝前的多次迁移，其地点、地望已有多位学者论述。因其与本文无关联，在此姑且不予讨论。<sup>[22]</sup>至于商王朝自成汤灭夏后至盘庚迁殷前，其间数度徙都，计有下列几次：

- ①仲丁迁隰(囂)。
- ②河亶甲居相。
- ③祖乙迁邢(耿)。
- ④祖乙迁于庇。
- ⑤南庚迁于奄。

对于商王朝时期都城之迁徙，其次数及地点目前仍有许多争议。例如有主张祖乙并未都耿，而应列入成汤灭夏后之迁都西亳。<sup>[23]</sup>然而，这不影响本文之讨论，故亦不细究。

关于商王朝的多次迁都的原因，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讨论，主要有以下数点：

①去奢行俭说：此说之兴起至迟起源于西汉时期，翼奉对于武帝“园白鹤馆”一事，曾有所上疏劝谏，其云：

臣闻昔者盘庚改邑，以兴殷道，圣人美之。窃闻汉德隆盛，在于孝文皇帝恭行节俭、外省繇役，其时未有甘泉、建章及上林中诸离宫馆也。<sup>[24]</sup>

其中即可看出“去奢行俭说”的影子。而刘向的《说苑》，更加深了此一论点的形成：

禽滑厘问于墨子曰：“锦绣，将安用之？”墨子曰：“恶是？非吾用务也！……殷之盘庚，大其先王之室而改迁于殷，茅茨不翦、采椽不斲，以变天下之视。当此之时，文采之帛，将安所施？”<sup>[25]</sup>

文中即指出，盘庚以先王之宫室太大、过于奢华，才行迁都之举，并力行俭约。

此后，“去奢行俭说”即成为东汉对盘庚迁殷所作的主要解释，如郎顗即云：“昔盘庚迁殷，去奢即俭”<sup>[26]</sup>；荀悦亦认为盘庚之迁殷是为了“革奢即约”<sup>[27]</sup>。他

们以为殷人久处一地，养成骄奢恶习，盘庚为了振兴王朝，脱离原有恶劣环境，去除奢侈而行俭约，乃有徙都之举。

②水患说：此说之形成，可能是受到《伪孔传》解释《书序》“祖乙圯于耿”之“圯”为“河水所毁曰圯”的影响，是在解释殷人屡迁之原因，较为盛行的一种论点。论者以为古代人民为便利取水，故聚落所在多濒临河流。而殷人活动之范围大致是在自古以来即时常泛滥的黄河中、下游地区，故殷人之屡迁，乃受水患之所逼。如顾颉刚、刘起釭二人即认为：

殷人惯于选择定都居住的地方在河滨，是为了用水的便利。但由于生产水平的低下，可能还没有沟洫排灌等水利设施，而黄河这条河又是这样地常常出问题的一条河，居住在它身边，确不是容易得到安宁的。……造成广大人民无法安居生活，因而不能继续在原地住下去的事实，应当是促成迁移的重要原因。<sup>[28]</sup>

王国维在考证商王朝迁都地望时，曾经将耿定为河内怀，而否定在山西皮氏县耿乡之旧说，其主要论据就是“河东之地，自古未闻河患，耿乡距河稍远，亦未至遽圯也”<sup>[29]</sup>，很明显地亦是受到“水患说”的影响。

③游农游牧说：此说之产生，大致可溯至郭沫若在讨论商代生产状况时，以为“大抵商民族在盘庚以前都还是迁移无定的游牧民族，到盘庚时才渐渐有定住的倾向”<sup>[30]</sup>。持此论者，认为殷人尚处于初发农业的阶段，农耕技术属粗放的耕作方式，每当一地之地力用罄而影响收获时，即需另觅耕地，以维持众人生计，政治中心之都邑亦因此随之转移；且畜牧仍占殷人经济生活之重要地位，追逐牲畜所需之水草，亦为造成都邑迁徙的重要原因。例如，傅筑夫即认为：

殷代经济系由渔猎游牧的自然经济，转变为农业经济的一个过渡期。……我们认识了殷代的经济结构，便可以知道殷人“不常宁”、“不常

厥邑”的原因。他们前后十六次的大迁徙，不是为了政治原因去迁都，也不是为了河患的原因去避难，而去为了经济的原因，去改换牧场，改换耕地。<sup>[31]</sup>

以上三种论点，目前史学界大致均采取否定的态度。以“去奢行俭说”而论，顾颉刚、刘起釭即直指“显然奢侈之说不可信”<sup>[32]</sup>；至于“水患说”及“游农游牧说”，杨升南亦有相当完整之驳斥。<sup>[33]</sup>因此，关于商王朝屡次迁都的探讨，学者现在大多改采政治原因来考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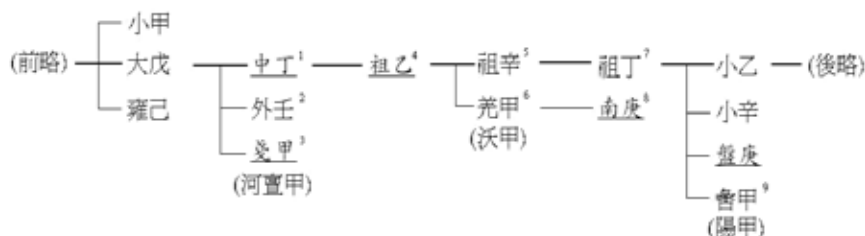
虽然同样都以政治原因出发，但对商王朝屡迁的解释则是包罗万象。有认为是战争扩张和退却的结果者<sup>[34]</sup>；有认为是为了对主要政治资本（青铜器）的制造原料铜矿和锡矿的追求者<sup>[35]</sup>；有从万国联盟的角度论说者<sup>[36]</sup>；或为王位争夺所致者<sup>[37]</sup>。但是，许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商王朝的屡次迁徙都城，与前述商王仲丁以来的九世之乱的关系。

若是纯粹以时间点来看，商王朝在盘庚以前的迁都，除了成汤灭夏后的迁都西亳外，其余几次的迁都，从仲丁开始，历经河亶甲、祖乙到南庚，正好都在此“九世之乱”内。诚如黎虎所言：

殷都屡迁的时间与商朝“比九世乱”的时间如此若合符节，决不是偶然现象，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内在的因果关系。<sup>[38]</sup>

笔者亦曾为文论述商王朝迁都原因，也是从此一角度着眼。认为自仲丁至盘庚的几次迁都，是由于王位争夺所造成的。由于仲丁以来破坏了原有的继统制度，引发了争夺王位的事件。夺取王位成功的人，欲维持其权力，必定希望能减少反抗势力的存在，而其中最有效、最直接的方法，便是将政治中心所在的都邑，迁到自己原有的封邑上，以脱离旧势力的威胁。<sup>[39]</sup>

我们在此再将商王朝此一时期的世系列出，更能看出它与都城迁徙的关系（其中划线者，为曾经迁都的商王）：



如前商王朝继统制度所述，自仲丁至阳甲的九世中，明显牵涉王位争夺的有仲丁、南庚与阳甲，而仲丁、南庚适有迁都之举。阳甲虽未进行迁都，但或许正因为如此造成其政权不稳，至其弟盘庚即位后，不得不在强大的反对势力下进行迁都，以巩固其政权。因此，盘庚之迁殷，亦与王

位之争夺脱离不了干系。<sup>[40]</sup>

至于，河亶甲与祖乙时期的迁都，或许也可从商王朝继统制度的破坏来思考。若如《史记·殷本纪》之载祖乙为河亶甲之子，则二人之迁都与王位的争夺亦是密不可分的。河亶甲为仲丁、外壬之弟，依商王朝早期传兄之子的

继统原则，其子祖乙没有合法的继承权。然而，河亶甲为了使其子祖乙得以继立，因此有了迁都之举，以脱离原有旧势力，为祖乙之顺利即位创造契机。其后，祖乙不但顺利继任，并且又将都城进行了迁徙，其目的也是为了其政权的巩固。

由此可见，商王朝自仲丁、河亶甲、祖乙、南庚等商王的历次迁都，甚至于盘庚的迁殷，都与破坏原有继统制度、造成王位争夺，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因此，从都城迁徙的角度来看，商王祖乙亦极有可能是河亶甲之子。

## 五 结 语

在讨论商王祖乙生父的问题上，《史记·殷本纪》的记载是重要的关键：

自中丁以来，废适而更立诸弟子，弟子或争相代立，比九世乱，于是诸侯莫朝。

由于仲丁破坏了商王朝原有的继统制度，为了要巩固其篡夺而来的政权，于是乃有迁都之举。其后至阳甲诸王等九世，只要是破坏（祖乙、南庚）、或是企图破坏（河亶甲）继统制度者，也都是为着同样的目的，均进行都城的迁移。阳甲将王位自南庚处夺回之后，也曾有过迁都的计划，但因故未能如愿，因此造成了政权的不稳，于是乃有日后其弟盘庚在位时的迁殷之举。

若是祖乙的生父为仲丁，其合法的继承权应是无庸置疑的。然而，从殷都的屡迁对应于商王朝的继统制度，可知自仲丁之后商王朝的屡次迁都，实均与继统制度的遭受破坏有关。因此，若是以迁都与继统制度破坏之关联性来看，祖乙亦是在破坏了商王朝的王位继统制度后，才有着迁都之举。由此可见，商王祖乙的生父为河亶甲之可能性极高。

此外，从甲骨卜辞商王对先公先王的祭祀中，可以看出商王朝自有其一套直系（大宗）、旁系（小宗）的宗法制度。在一般的卜辞中，河亶甲均为旁系小宗，然而，在有些时期较早的卜辞中，商王朝宗法制度尚不如此严格，河亶甲亦有被视为直系大宗的情形。若以有子即位方能成为直系（大宗），则河亶甲之所以曾被视为直系（大宗），当然是因为有子为王所致，而此人当然也就是《史记·殷本纪》中所载的祖乙。因此，从商王朝的宗法制度来讨论，商王祖乙的生父也应是河亶甲。

然而，如此一来仲丁在宗法制度的直系（大宗）地位，则是有问题（无子即位）。但是，正由于仲丁的夺位，他们这一支系的子孙才有可能继任为商王。因此，在各项规定尚不严格的时期，仲丁就被视为直系诸王之一。到了帝乙、帝辛时期规定一世只能有一王为直系之时，也由于仲丁对此一系子孙能够为王，贡献实在太，所以只好舍河亶甲而取仲丁了。因此，才有甲骨文研究学者将祖乙视为仲丁之子的情形产生。

因此，无论是继统制度、宗法制度还是都城的迁徙，均透露出商王祖乙之生父为河亶甲的可能性极高。太史公

《史记·殷本纪》中有关商王世系的记载，经由甲骨文之研究，虽然发现有些错误而予以修正之处，但祖乙为河亶甲之子，或许仍较合乎事实。

## 注释：

- [1]王国维.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[A].收录于氏著.观堂集林[C].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.2001.页 284.
- [2]王国维.殷周制度论.页 289.
- [3]陈梦家.殷墟卜辞综述.页 370-373;黄然伟.殷礼考实.收录于氏著.殷周史料论集.香港:三联书店.1995.页 46-61.
- [4]范文澜.中国通史.北京:人民出版社.1994.页 56-57;李学勤.论殷代亲族制度.文史哲.1957(11).页 35-36;张光直.商王庙号新考.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.1963(15).页 85-87;吴浩坤.商朝王位继承制度论略.原刊学术月刊.1989(12).现收录于宋镇豪、段志洪主编.甲骨文献集成第 21 册.成都:四川大学出版社.2001.页 44-46.
- [5]丁山.商周史料考证.北京:中华书局.1988.页 119-120;赵锡元.论商代的继承制度.中国史研究.1980(4).页 27-30.
- [6]杨升南.是幼子继承制.还是长子继承制? .中国史研究.1982(1).页 107-111;常玉芝.太甲、外丙的即位纠纷与商代王位继承制.原刊殷墟博物苑创刊号.(1989).现收录于甲骨文献集成(第 21 册).页 38-39;常玉芝.论商代的王位继承制.中国史研究.1992(4).页 60-64.
- [7]郑宏卫.商代王位继承之实质——立壮.原刊殷都学刊.1991(4).现收录于宋镇豪、段志洪主编.甲骨文献集成(第 21 册).页 85-86.
- [8]陈梦家.殷墟卜辞综述.页 371.
- [9]赵锡元.论商代的继承制度.中国史研究.1980(4).页 26.
- [10]张光直.商王庙号新考.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(第 15 期).页 86.
- [11]郑慧生.从商代的先公和帝王世系说到他的传位制度.史学月刊.1985(6).页 6.
- [12]王国维.殷周制度论.页 290.
- [13]据今本竹书纪年之记载.太戊在位 75 年.
- [14]根据商王朝的宗法制度与殷都屡迁的原因.我们认为祖乙之立是破坏原有继统制度而得来的可能性极大.详见以下商王朝的宗法制度与殷都屡迁的原因之叙述.
- [15]王国维.殷周制度论.页 291.
- [16]黄然伟.殷礼考实.页 46.
- [17]史记·殷本纪:“帝乙长子为微子启.启母贱.不得嗣.少子辛.辛母正后.故立辛为嗣.”虽和吕氏春秋之载有所出入.但暗示商朝末年确实已有立嫡之制.则是一致的.
- [18]胡厚宣.殷代婚姻家庭宗法生育制度考.收录于氏著.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.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.2002.页 105.
- [19]参考黄然伟.殷礼考实.页 48.
- [20]许进雄.殷卜辞中五种祭祀的研究.页 31.
- [21]严一萍.戡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.台北:艺文印书

- 馆.1991.页 12.其中括号内文字.为严一萍所补.另外.吴其昌殷虚书契解诂一书中对此亦有补文.虽然文字所在甲骨之位置不同.且缺祖乙以下之文.但“大戊至戈甲”部分与严一萍全同(可参考严一萍.前引书.页 14 附图).
- [22]有关商王朝建立前的多次迁移.可参考王国维.自契至于成汤八迁.收录于氏著.观堂集林.页 326-327;丁山.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.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(第五本).1935.页 93-102.
- [23]杨升南.“殷人屡迁”辨析.收录于胡厚宣主编.甲骨文与殷商史(第二辑)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.1986.页 201-202.
- [24][汉]班固.汉书·翼奉传.卷七十五.
- [25][汉]刘向.说苑·反质.卷二十.
- [26]后汉书·郎顗传.
- [27]荀悦.申鉴·时事.
- [28]顾颉刚,刘起釭.盘庚三篇校释译论.历史学 1979 年第 2 期.页 45-46.
- [29]王国维.说耿.收录于氏著.观堂集林.页 331.
- [30]郭沫若.中国古代社会研究.收录于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.郭沫若全集·历史编(第一卷).北京:人民出版社.1982.页 196-197.
- [31]傅筑夫.关于殷人不常厥邑的一个经济解释.文史杂志 第四卷五、六合期.1951.页 24-27.
- [32]顾颉刚,刘起釭.盘庚三篇校释译论.页 45.
- [33]杨升南.“殷人屡迁”辨析.页 186-191.
- [34]杨升南.“殷人屡迁”辨析.页 204-217;邹衡.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.收录于氏著.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北京:文物出版社.1980.页 209-210.
- [35]张光直.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.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(第 55 本).1984.页 60-67.
- [36]晁福林.从方国联盟的发展看殷都屡迁的原因.北京师范大学学报.1985(1).页 65-73.
- [37]黎虎.殷都屡迁原因试探.北京师范大学学报.1982(4).页 42-55.
- [38]黎虎.殷都屡迁原因试探.页 49.
- [39]江达智.“殷人屡迁”的一个政治因素——自仲丁至盘庚的迁都.文史论集(第二期)台南:国立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.1991.页 1-22.
- [40]郑玄对尚书·盘庚做批注时.曾云:“祖乙居耿.后奢侈踰礼.土地迫近山川.尝圯焉.至阳甲立.盘庚为之臣.乃谋徙居汤旧都.”可见阳甲在位时.亦曾有过迁都的计划.只是未能成行.最后在其弟盘庚在位时才得以完成.

(责任编辑:王晚霞)